

理论视点

2017 年第 1 期 总第 27 期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编印

2017 年 1 月



西安石油大学
新闻客户端



西安石油大学
官方微信

目 录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1
反对“四个主义”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9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统一战线方式的历史演进.....	13
明确高校思政工作的“事”“时”“势”.....	17
“一带一路”：以能源资源促共赢发展.....	19
锐词(27).....	23
推荐书目(25).....	24

报送：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统战部，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宣教处、研究室，
省委统战部六处、研究室。

抄送：校领导。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主送：各学院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系），
机关、教辅、后勤各单位，各民主党派。

编辑：赵喜军 审核：李国武 2017年1月11日 印发 04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刘奇葆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战略举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任务，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深刻阐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这些重要论述，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近年来，各地各新闻单位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积极投身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大力发展新媒体业务，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此长彼长的态势日益凸显，新闻舆论工作气象一新。一是主流媒体传播阵地得到拓展。传统媒体积极向网上发展，全媒采编平台、新闻客户端、数据中心等重点项目取得进展，新媒体布局初步形成，覆盖用户大大增加。二是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明显提高。主流媒体发挥内容资源优势，加强融媒体内容创作生产，推出了一批“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新媒体品牌，培养锻炼了一批全媒人才。三是融合传播技术广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到全媒采编平台构建之中，移动直播、H5应用等技术在采编制作环节普遍采用，机器人写稿、无人机采集、虚拟现实等技术从无到有，实现了突破。四是融合发展引领新闻传播创新。各媒体探索运用全媒体多样化传播形式、分众化互动式服务方式、大众化生活化话语表达，推动了新闻传播全方位创新。实践证明，党中央作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抓住了历史机遇，跟上了时代潮流，坚定有力地推进这场重大而深刻的媒体变革，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赢得了战略主动，为实现“两个巩固”根本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动力不足的问题，有的缺乏居安思危、求新图变的紧迫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比如，思路不清的问题，有的深入研究不够、总体设计缺乏，路线图、施工图不明晰。比如，工作偏差的问题，有的传统业务与新媒体业务还是“两张皮”，互不相融；有的新媒体名号与母体相分离，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品牌影响力。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当前，互联网正加速重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主流媒体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融合发展的任务更为紧迫。一是传播形态持续演变，要求我们通过深度融合占据制高点。信息载体、传播渠道更新迭代越来越快，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已成为主要信息入口，聚合类平台、自媒体公号不断涌现，网络直播、问答社区等成为舆论生成传播重要源头。面对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只有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才能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二是传统媒体不进则退，倒逼我们增创深度融合新优势。纸媒发行、广告连续下滑，不少都市类媒体收入“断崖式”下跌。广播电视的情况虽然好于报纸，但受众日渐分流，广告收入也在下降。在现实压力下，一些媒体人才流失加剧。面对这种情况，只有推进深度融合，传统主流媒体才能走出一条持续发展的新路。三是国外媒体加速转型，启示我们加快深度融合提升竞争力。现在，国外主流媒体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有的把原来的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中心“合三为一”，打造统一的多媒体新闻编辑部，还有的建成了“蜘蛛网”式的融媒体中心。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只有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才能勇立潮头、加快发展，在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竞争中增强实力、扩大影响。

媒体融合已经到了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必须坚定信心、乘势而上，着力创新工作思路，着力深化媒体内部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拓宽传播平台载体，着力强化人才支撑和政策保障，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

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二、确立移动媒体优先这个发展战略

现在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我国移动新闻用户已超过5亿，占网民总数的70%以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以预见，随着5G、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技术不断演进，移动媒体必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必须顺应移动化大趋势，强化移动优先意识，实施移动优先战略。

1. 打造移动传播矩阵。移动传播载体发展迅速，新闻客户端、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移动电视、网络电台等不断涌现，形态丰富多样。目前来看，新闻客户端功能比较完备、信息容量大、方便易用。传统媒体进入移动传播领域，需要关注新闻客户端发展，推动移动媒体建设，形成载体多样、渠道丰富、覆盖广泛的移动传播矩阵。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专业采编优势、信息资源优势、媒体品牌优势，强化用户意识，优化使用体验，实现精准推送，最大限度吸引用户。

2. 创新移动新闻产品。优质内容是媒体的立身之本。主流媒体的移动新闻生产，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重点在“准”、“新”、“微”、“快”上下功夫，打造与主流媒体品格和气质相一致的移动新闻精品。“准”就是要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守护好准确、权威、专业的“金字招牌”，把准方向、把好导向，为用户提供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新”就是要创新内容表达、丰富呈现形式，推出各种样式和形态的移动新闻产品，比如直播新闻、互动新闻、个性新闻、可视化新闻、动新闻、听新闻、大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微”就是要多提供短小精悍、鲜活快捷、“微言大义”的信息。要善于运用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微动漫等方式，推出更多微内容、微信息，方便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快”就是要抢占第一

时间、第一落点，即时采集、即时推送，快速做出反应、迅速送达用户，在传播中抢得先机。

3. 紧盯移动技术前沿。技术是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媒体亟待补齐的短板。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必须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用最好、最新的技术提升采编能力，拓宽传播领域。一方面，要用好现有技术。充分运用数据抓取、云计算、数据库、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整合内容资源，提升数据存储挖掘利用能力；充分运用4G传输、流媒体传输、移动直播、无人机采集、全景拍摄等技术，获取充足信息，提升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稳定性；充分运用虚拟现实、3D、H5等技术，丰富表现形式，增强信息呈现的质量和冲击力。另一方面，要研发亟需技术。在已经出现的“用户画像”、场景匹配、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上，研究适用于新闻领域的个性分析、即时推送、机器人写作等技术应用。要密切关注5G传输、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技术发展动态，积极谋划和布局未来移动传播终端，着力增强相关技术研发应用能力，抢占移动技术发展应用的先机。技术是为内容服务的，运用任何信息传播新技术，都要加强技术把关、内容把关，确保新闻真实准确。

三、突破采编发流程再造这个关键环节

重构采编发网络、再造采编发流程，是媒体深度融合最需要突破的难点，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必须攻克的“腊子口”。

1. 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构建适应融媒体生产的采编发网络和采编发流程，首先要正确处理“统”与“分”的关系，精心设置组织架构，形成“一次采集、多种产品、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强调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并不是要求把采编发各环节绝对地“统”起来，当然也不能按媒体属性简单地“分”开来做，报、台、网、微、端各搞一摊。从实践探索来看，在深度融合过程中，一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采编指挥调度、重大选题策划，采访力量、稿件资源方面可以尝试统起来，增强调度指挥能力、一线采写能力、新闻原创能力。二是

编辑力量可以有统有分，“分”就是按业务领域分设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等专业编辑部门；“统”就是改变报网、台网分办的做法，让这些按专业划分的编辑部，既管报纸版面、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内容，又领办网站、“两微一端”的频道栏目内容。三是可以按媒体形态分设报、台、网、微、端负责内容总成的总编辑室。具体到每个新闻单位、不同形态媒体，哪些该统、哪些该分，怎么统、怎么分，还要结合实际深入研究、搞好设计。

2. 分层级构建新型采编发网络。根据“统”“分”结合的思路，新型融媒体采编发网络的基本架构，可以由指挥调度中心、采编发联动平台、采访编辑技术各部门、各媒体总编辑室等方面组成。指挥调度中心是整个采编发网络的核心层，负责全社、全台各类媒体宣传任务统筹、重大选题策划、采编力量指挥。采编发联动平台是常设性的运行机构，也是创新融合机制的重要节点，具体负责对指挥调度中心指令的传达执行和需求反馈。采访、编辑、技术等各部门派代表全天候联合办公，执行指挥调度中心决策，同时根据工作需求随时向上反馈情况，并进行跨部门沟通协调。采访、编辑、技术各部门是整个新型采编发网络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全媒体采访部门、各专业编辑部门和技术支持部门等。全媒体采访部门负责把所有的采访力量整合起来统一调度，各专业编辑部门负责传统媒体的编辑任务以及网、微、端相关频道栏目的内容制作，技术支持部门统筹管理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人员调度。各媒体总编辑室按照媒体形态设立，包括报纸或新闻频率频道总编辑室、网站总编辑室、客户端和其他新媒体总编辑室等，主要负责把各专业编辑部门所编辑的内容整合起来，统一设计包装，完成版面栏目总成，统筹刊播管理。这个基本架构是一个原则性设计，不同媒体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拿出设计方案，分步加以实施。

3. 创新媒体内部体制机制。构建新型采编发网络，必然要求对新闻单位内部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要按照新的业务流程调整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破除采编部门间相互分割、自成一体的藩篱，破除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和新媒体采编发环节的壁垒，创新内部组织结构，建立采编分离、全媒体生产的运行机制。这项工作有很大难度，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勇于担当、锐意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体制机制改革向前推进。

四、抓好“中央厨房”建设这个龙头工程

“中央厨房”就是融媒体中心。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中央厨房”是标配、是龙头工程，一定要建好用好。

一要搞清楚“中央厨房”是什么。这涉及“中央厨房”的功能定位问题。在融媒体采编发网络中，“中央厨房”既是基础和技术平台，也是大脑和神经中枢，应具备集中指挥、采编调度、高效协调、信息沟通等基本功能。在采编发网络的基本架构设计中，指挥调度中心、采编发联动平台这两个层级是“中央厨房”的核心部分，其运转要实现“人人见面”、面对面工作，其他层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人机见面”。这样的设置，有利于实现管理扁平化、功能集成化、产品全媒化。

二要搞清楚“中央厨房”怎么建。这涉及“中央厨房”的硬件、软件配置问题。“中央厨房”要有一个工作平台，保障采访、编辑、技术各部门代表集中办公，开展常态化工作。有条件的还可以采取“蜘蛛网”式的采编发大平台架构，做到人员混合编排、一体办公。要有一个技术支撑体系，打好底层技术基础，配好硬件设施，为采编发网络稳定运行提供可靠技术保障。要有一个全媒体内容管理系统，加强稿库、资料库建设，汇集各种稿件、节目素材、新闻背景资料，集成各种编辑软件工具，为记者编辑获取新闻线索、查阅背景资料、创作多媒体稿件提供支撑。要有一个传播效果监测反馈系统，及时对本媒体稿件、节目传播力影响力作出评估，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参考选题，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对“中央厨房”建设来说，这“四个一”是基本标准。各媒体要从自身条件出发，坚持基本标准，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央厨房”建设的内容。

三要搞清楚“中央厨房”怎么用。这涉及到日常运行机制问题。建好

“中央厨房”的硬件设施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套新的运行机制。要按照“中央厨房”的功能定位，建立总编协调制度、部门沟通制度、岗位值班制度、采前策划制度、线索通报制度、效果反馈制度等，确保“中央厨房”与采编发网络紧密结合、无缝衔接。“中央厨房”建设投入大、技术要求高，每家媒体、每个地方都单独研发技术系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可考虑建立媒体技术合作共享机制，把比较成熟的技术系统推广运用起来。

五、强化全媒人才培养这个重要支撑

全媒传播需要全媒人才，媒体核心优势是人才优势。要把全媒人才培养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切实有力举措，加快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过硬的全媒化集团军。

1.着力推动现有人员融合转型。目前，会使“十八般兵器”的全媒人才还属于“特种兵”，很能干但数量少，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需要，亟须加快全员融合转型。要通过专题培训、实战演练、业务研讨、观摩交流等方式，重点引导现有人员向全媒记者、全媒编辑、全媒管理人才转型，在观念和技能方面有大的提升。要打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人才使用通道，推动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到新媒体平台上去施展拳脚，开办原创栏目，培育品牌公号，成为传播正能量的“网红”。

2.着力抓好后备人才储备培养。现在，国内高校新闻院系基本都开设了新媒体课程，但与融合发展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要用好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高校人才培养基地等平台，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材编写等各个环节，都要适应媒体深度融合的需要，为新闻战线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全媒人才。要促进高校新闻院系与新闻单位的对接交流，强化对媒体融合的前瞻研究、趋势分析、实践总结，为推进深度融合提供学理支持。

3.着力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要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用人体制、优化人才环境。要研究设计更

加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职级晋升制度、薪酬分配办法，吸引凝聚全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等方面急需的高端人才。在当前情况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以后，用人体制、人员身份不同的问题将更加凸显，要深入研究、妥善解决，逐步实现同岗同责、同工同酬，提升从业人员的事业心归属感。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是一项战略任务、系统工程。各地各部门各新闻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统筹协调，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加快省级媒体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以中央媒体为引领、省级媒体为骨干的融合传播布局。要做强媒体主业，深耕专业领域，积极探索信息服务、版权合作、广告经营等多种盈利渠道，找到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不断开创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新局面。

（本文刊发于2017年01月11日《人民日报》，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2017年1月5日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反对“四个主义”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石平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用一个电台指挥千军万马，“嘀嗒、嘀嗒”的电报声，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全党全军同志都无条件地执行。为什么仅凭“嘀嗒、嘀嗒”，就能让全党行动如一人？这是因为，延安时期开展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扭转了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维护了党中央权威，保证了全党令行禁止。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围绕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明确规定：“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历史与现实同频共振。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优良传统，延续“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红色基因，切实防止和解决“四个主义”。

从党内政治生活来讲，个人主义就是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整体利益之上，为达个人目的不惜损害党的团结统一，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分散主义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违反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指示和决定，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进行抵制，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自由主义不要集体原则，无视组织纪律，主张无原则的放任。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法纪、不讲规矩，不把任何人、任何组织放在眼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本位主义考虑问题时以小团体为中心，无论利弊得失都站在局部的立场上。本位主义就是俗称的“屁股决定袋”，在执行中央决策中，有利于地区、单位的就落实、照办，要求地方做出牺牲的就搁置、舍弃。虽然这“四个主义”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地位格格不入的，违背了党的根

本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破坏了党的政治纪律，是损害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对“四个主义”的态度一直旗帜鲜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历数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群众利益为重、以党的团结为重，坚决把自由主义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1962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发言中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明确强调：“对于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任何部门、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对党的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公开地或者变相地进行抵制，以至擅自推翻，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对“四个主义”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党中央才始终得以维护权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条件下，国内改革正处在攻坚期、发展正处于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党内“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现实地摆在面前，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前进的道路虽没有了当年的硝烟战火，却同样充满艰难险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亿万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这划时代的重要关口，全党同志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行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基本要求，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

但是有一些地方、部门或党员干部，对待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阳奉阴违；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中央政策法规选择性执行；无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领导班子内部专横霸道，搞“一言堂”，等等。这些无视组织程序，“迈过锅台上炕”，不顾中央禁令，“心里装着小九九”的种种行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中都有反映。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违背党中央决策部署另搞一套，不讲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自行其是，搞“家天下”“独立王国”，最后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上述这些行为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它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丧失、政治纪律的缺失，任其泛滥就会使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政府没有公信力和执行力，使国家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步调一致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就必须时刻警惕这“四个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四个主义”。

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最核心的要求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到在思想上充分信赖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感情上深刻认同核心。要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切实做到政治上坚定不移、坚信不疑，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高度自觉，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最突出的要求就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能先斩后奏，更不能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同时，要把党中央精神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处理好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部署，包括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都要符合党中央精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这个前提下，鼓励和支持各部门各地区担当作为、大胆工作，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不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之名，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之实，不能自行其是、各自为政，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更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必须始终不渝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时时处处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摘自2017年第1期《求是》）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统一战线方式的历史演进

肖巧平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方式随着国情、社情的变化而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方式大致经历了法律保障、政策统领、制度彰显和法治主导四个特色比较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9月—1954年8月）：以法律保障为主要特点。法制主导型是指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以立法方式表现，通过法律推进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以法律的方式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统战工作的法律条款。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这个时期立法制度并未形成，除了《共同纲领》规定政协代行人大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的权力外，哪些机构享有立法权、立法权限有多大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上条例、通则、办法等或者有政协组织法的授权，或者由政务院制定，而且采用法律形式，内容具有法的效力，因此，都可以被视为法律。可见，这个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法律来推进和保障。当时的领导人十分重视依靠法律

来推进工作。

第二阶段（1954年9月—1989年12月）：以政策统领为主要特点。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灵活多变、及时调整是政策的最大特点。

法律保障转入政策主导，最主要的原因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大的职权。诚如宪法序言中所说：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宪法序言同时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针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对象，党制定了不同的统战政策。譬如，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确立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政策。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将原有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调整为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等等。

此期国家领导人或中央文件在提到统一战线时，大多采用“政策”。例如，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中专门谈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82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讲到统战工作应该抓好的几件事中，就有“狠抓各种政策的落实，包括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以及对归国侨胞的政

策，等等。”当然，这个时期还留有“法制型”的痕迹。如1957年1月出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地方工作委员会暂行组织简则》，此外也有制度的萌芽。

第三阶段（1988年5月—2014年10月）：以制度彰显为主要特点。由政策统领转入制度主导主要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由主要依靠政策向开始重视法制转变。

其一，这个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建章立制工作，统战制度体系基本搭建完成。从1988年到2005年，完成了政协全部机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秘书长、主席会议）的规则。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政协的三大职能，为确保这些职能的履行，出台了一系列制度，确认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目的、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并规定了保障性的要求。

其二，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重要文献看，统战的制度建设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时期“制度”出现的频率较高。譬如，江泽民同志就曾指出：按规定应当交政协协商的问题，一定要在决策之前交政协协商，并在协商中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其三，在政协的规范性文件中多次出现了“制度化”的提法。如，1989年1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1995年1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2005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能看到加强统一战线“制度化”建设的提法。

第四阶段（2014年10月至今）：以法治主导为主要特点。法治主导型是指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依靠“法治”推进。这个阶段始于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标志性事件则是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内法规，也是我国第

一个将“统一战线”与“法”连接起来的规范性文件。当然，法治主导型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建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法治化长效机制，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思想上认同统一战线法治主导。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且出台了专门的党内法规，这意味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实现统战的依法而治会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进而提升执政能力。二是要制定科学的统一战线法律。与第一阶段的法制主导型相同的是，法治主导也要有相关的立法，不同的是更强调立法的科学性，要完备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具体法律规范，突出针对性、可执行。三是要让“依法”开展统战工作成为主要方式。努力实现依法领导统战工作，依法开展统战工作。

（摘自2016年08月25日《光明日报》）

明确高校思政工作的“事”“时”“势”

孙晓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这是对当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性认识的精辟总结和生动诠释，明确了高校思政工作的本质内容、时代任务和方向大势。

一、“因事而化”：在内容设计上做到贴近实际和因材施教

一方面，要有全局意识、协同意识，注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效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贴近学生的思想需求、心理诉求和知识要求，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设计和体系创新。应在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思想教育、新闻宣传和文化建设的关联性以及高校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耦合性，切实做到协同推进，精心设计教育内容，科学转换话语体系，使各项思政举措在育人取向上相互配合、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另一方面，抓好高校思政工作要注意区分层次、整体推进，既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目标，也要有具体的任务分解，做到“立教有体、施教有序”，避免板起面孔、空洞乏味。具体而言，要从大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出发因材施教，综合考虑其身份地域、成长背景、专业特点、兴趣爱好、思想特性等多方面因素，精心设计施教内容。要在理论讲授中创设情境、设疑导思。科学运用现代传媒科学和先进网络技术，将最具体、最现实以及最能触动受教者心灵共鸣的理论内容，采用案例、专题、纪录片、微电影等新形式新载体，及时增补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体系中，真正融入学生的头、心理和灵魂，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二、“因时而进”：在时代发展中树立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

一方面，要在把握教书育人规律的基础上树立问题意识。问题可以反

“一带一路”：以能源资源促共赢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三年来，成效显著，开局良好。当前，应在沿线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将能源资源作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着力点，用心培育并使其发挥关键驱动力作用，带动沿线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而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压舱石。为此，应从战略全局看待能源资源问题，在政策规划、基础设施、制度安排、资金投入等方面，围绕能源资源开展合作，谋求共赢。

能源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力载体

古代丝绸之路源于发达的丝绸贸易，以丝绸为媒介，带动了东西方的贸易、人员往来，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推动了生产力的相互促进和文明的广泛传播。新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样需要一个切入点和载体。从“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沿线各国的响应程度来看，这些国家大都赞同和接受“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也更加看重经济发展和项目落地。因此，只有建立具体的产业支撑，使当地经济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也只有为“一带一路”找到实体内涵，才能使前期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拥有具体的承载和服务对象，才能发挥好既定功能，确保“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入。

目前，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可以充当这一载体，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丝绸”。能源资源是世界上最大宗的贸易投资品种。沿线国家在这一领域利益契合度最高、开展长期稳定合作的愿望和基础也最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能源资源主要贸易国，能源资源是其优势要素、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另外，由于能源资源产业链条长，对上下游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巨大的外溢效应，还可促进各国在宏观政策、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为此，

映时代的声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的发展需求和期待，关键就在于善于发现、提炼、分析、讲透当今时代的问题，摒弃说教思维，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好道理。

另一方面，要在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树立实践导向。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内在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确立实践标准、增加实践权重、提高实践分量，使学生真正掌握理性解读社会、科学关注国家、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具体而言，可以考虑通过PPT展示、辩论赛、演讲赛以及拍摄微电影、表演情景剧等多样化的课堂展示方式，使学生形成自我学习、自我探究、自我理解的良好习惯，在课堂参与中将相关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与此同时，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找准与大学生思想的共鸣点、诉求的交叉点、利益的汇集点，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实际，用生动的方式引导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鲜活的事例说服人。

三、“因势而新”：在价值导向上坚持经世致用和立德树人

一方面，工作方法上要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导向。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多元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增多、网络社会不断延伸、全球化时代已然来临等复杂背景下，高校思政工作要在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在方向上始终坚定不移，真正契合当下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要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交流、变显性说教为隐性启发、变简单粗暴为循循善诱，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塑造中国好形象，使学生“学到心里来，走到外面去”，最终使学生能够真听、真懂、真信。

另一方面，工作方向上要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既不能培养无才无德的“废品”，也不能培养有德无才的“次品”，更不能培养有才无德的“危险品”。要构建“大思政”格局，使其他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做到协同推进、互动联通。

（摘自2017年01月07日《南方日报》）

应围绕能源资源着手启动一些必要的规划安排。

“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面临新契机

亚洲既有世界能源资源的主要供给国，也有主要消费国。当前，沿着“一带一路”的能源资源流动逐渐成为国际能源资源的主要流向，供给国和需求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能源资源合作越发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需要。

近年来，全球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给推进“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带来了新契机。国际原油价格从两年前的每桶100美元以上高位大幅下跌、震荡下行，今年年初达到30美元左右的低点；目前又反弹到50美元左右，总体呈探底回稳态势，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会在40~60美元区间波动。天然气、铁矿石等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原油基本相似。受此影响，大多数能源资源国家经济下行、财政恶化，国内政局也受到很大影响，迫切希望稳定能源资源产业，并以此为支撑调整经济结构。在价格高位时，国际大宗商品处于卖方市场，供应国缺少对外合作的积极性；现在市场向买方倾斜后，其谋求对外合作的意愿明显上升。经历了市场的剧烈波动，供需双方逐渐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都希望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可预期的价格走势，以及一种相互利益可平衡的供需关系。这些因素为推进“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提升沿线国家能源资源产业发展水平

依托现有资源基础，开展能源资源产品的深加工。西亚的石油，中亚的天然气、铀，南亚的铁、铜，东南亚的天然橡胶等，都是当地特色产业。当前能源资源初级产品价格较低，未来产业势必向深加工转向。东亚和西欧一些国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在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商业化经验，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产业升级提供支持。

扩大产业辐射面，发展能源相关产业。利用能源价格较低的时机，根据水资源、环境等条件，借鉴国际成熟经验，适度发展氧化铝、多晶硅、

焦炭、炼钢等高载能产业。发挥本地区一些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合作在能源资源服务产业开辟新市场，打破西方公司垄断。

积极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一带一路”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巨大，各国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态度积极。当前，风电、光伏、核电技术发展趋于成熟，相较于传统能源具备一定竞争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抓住这一机会，打造低碳经济增长点，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提升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油气基础设施投资，扩大中国、俄罗斯、中亚、海湾地区国家间油气合作和管道建设，形成互联互通的油气管网。深化大湄公河流域电力合作，以双边电力贸易为基础，共建大湄公河次区域统一电网，为区域发展提供能源保障。

通过能源资源合作带动沿线国家全方位合作

以能源资源政策沟通为引领，带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沿线各国的参与。能源资源可以提供先行试验示范，通过具体项目的推进，促使各国政府在宏观政策、发展规划上进行沟通与协调。

以能源资源商品贸易为基础，全面提升沿线国家间的经贸水平。通过挖掘传统初级产品的贸易潜力，扩大能源资源相关产品交易，拉动大宗商品贸易的回升。另一方面，通过各类能源资源合作的实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物流运输网络，培育区域统一大市场。

通过能源资源产品交易，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规模。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减少汇率变动风险。“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将为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创造大量需求，从而带动沿线地区的金融合作进一步提速。

通过能源资源项目建设，带动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建设是一个新的需求增长点，能够为产能合作提供新市场，也是国际制造业合作的重点领域。抓住并开拓这个新市场，将为沿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争取时间，有利于拉动经济复苏、促进民众就业。

通过商签能源资源有关协议，促进区域经贸制度性安排发展完善。能

源资源贸易投资合作，涉及大量法律、规则、标准等规制性内容。积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有利于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双边自贸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体系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建立亚洲能源资源伙伴关系，实现“四个稳定”

当前，在能源资源价格动荡和世界能源配置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应当加快推进建立亚洲（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伙伴关系，本着“供需合作、互利发展”的宗旨，以期实现四个“稳定”：通过建立稳定的供求协商关系，形成对价格和市场的稳定预期，从而促进供需双方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对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发挥稳定作用。

在亚洲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建立部长级对话机制，开展政策交流和协调，加深理解，为能源资源合作创造必要共识约定和政策环境。建立亚洲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体系，提升亚洲国家能源资源产品定价话语权，推动供需双方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稳定机制。组织若干有国际影响的油气、电力、新能源、金属矿产、农产品等经贸投资洽谈会，为亚洲国家产业对接、项目合作、信息共享搭建平台。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特点，在现有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中分别推进能源资源务实合作。譬如在中亚，可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天然气、矿产资源开发、贸易和深加工；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可利用中国—海合会平台深化石油资源合作开发、化工产能合作和双向投资；在东南亚，可利用中国与东盟“10+1”机制开展电源开发、电网互联互通、能源运输合作，以及探索南海共同开发。

（摘自2016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

锐词（27）

后备箱经济

这是休闲农业的形象说法。一般市民从城市到乡村去旅游，散客多会选择自驾出行，去的时候汽车后备箱是空的，而在返程时在后备箱捎带上当地特色产品。同时，在自驾游热带动下，帐篷、烤炉等户外用品都成了后备箱不可或缺的“好伙伴”，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科技黑箱

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知识经济等。

慢就业

指一些大学生毕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续深造，而是暂时选择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创业考察，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现象。据统计，越来越多的“90后”年轻人成为“慢就业族”。有人认为，这是大学生面对求职竞争实行的“错峰就

业”；也有人认为，这看似浪漫实则荒诞的词语，将严峻的现实表达得风轻云淡，本质上是掩耳盗铃。

炒信

指在网络商城上利用网络虚假信息炒作商家信用。通过虚假的交易信息，买卖双方均获得了各自所需的利益。网店主发布虚假物品成交的信息从而提高相关物品的销售及店铺的信誉，使自身产品被购买的概率增加。而职业“炒信”买家，只要动动鼠标便可获得每笔几元甚至几十元的佣金。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还会使整个网络购物平台受到质疑。

海外红色旅游

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踏上“红色之旅”。这种旅行方式也正在成为中国人旅游新风尚。位于德国古城特里尔市的马克思故居，是许多访欧中国游客的必经之站，2015年有近10万中国人到此参观。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列宁故乡等地，也都是“海外红色旅游”的热门景点。

冷热水效应

一杯温水，保持温度不变，另有一杯冷水、一杯热水。当先将手放在冷水中，再放到温水中，会感到温水热；当先将手放在热水中，再放到温水中，会感到温水凉。同一杯温水，因方式不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感觉。这就是著名的“冷热水效应”，对人际交往、企业管理等具有较大启发。

推荐书目 (25)

《大国外交》

王 帆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大国崛起，需要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的一抹亮色，正前所未有的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大国外交”的重大转变，外交新理念不断推出，南海推进战略，APEC与中国，亚投行，“一带一路”，种种新举措，令世人炫目，充分体现了大国外交智慧和力量。

但是，中国的周边形势仍存在若干不利：美国高调推行所谓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纷争不断，波谲云诡。秉持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中国，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积多年研究中国外交和大国战略的成果，对中国近几年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权威解读，为你揭秘中国外交大格局的大国智慧，讲透习近平特色外交全球布局的奥秘，全面预示中国外交未来30年走向。